

“马克思的脚印”及其他

司马心

长城之雄伟，雄伟到太空中可以看见，这样一种说法，是进了中小学课本的，几十年来，“振奋”着少年的心，直到“神五”上天，杨利伟一句真话，泡沫才算破灭。但是仍不甘心，过了几天，一条“普罗巴”卫星“最近拍摄到长城照片”的消息，又传遍了大小网站，直到欧洲航天局道歉，说那“长城”其实是一条大河，因此搞错了，才复又平静下来。于是人们要问，靠一个关于长城的神话，真能弘扬起青少年心中的爱国主义么？

还有一个说法，也是载入中小学课本，而且“影响了几代人”的，那便是说马克思当年，在大英博物馆苦读，苦读之苦，竟然在阅览室内水泥地上磨出两个深深脚印！然而北大的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，却亲访马克思读书处，怎么也找不到“马克思的脚印”，据馆内工作人员说，马克思并非只在一个固定位子上读书，怎么会有“一对深深的脚印”呢？再说读书也不是少林寺站桩，并不必在坚硬水泥地上踏出脚印来，而且“清晰可见”。其实马克思有没有脚印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崎岖山路上攀登的科学精神，重要的是他兼容并蓄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，何必用并不存在的“马克思脚印”才能“教育后代”呢？

世乒赛上，中国队“偶失”圣·勃

初夏，一场小雨刚停，悄悄进入皖东滁州市郊的琅琊山。那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几乎能映出行人，我低头凝视着它，在遐思中仿佛看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脚印，宛若听见了他的吟咏：“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……”

路过野芳园、听泉亭、让泉，便瞅见位居“中国四大名亭”之首的醉翁亭掩藏于绿树间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北宋庆历五年（1405年），欧阳修因参与革新遭权臣排挤，被贬为滁州太守后，感于时愤，寄情山水，琅琊寺住持智仙出于对他的敬重特筑一亭；欧阳修自称“醉翁”，便为亭题名“醉翁亭”，并写下传诵千百年的散文《醉翁亭记》；后来苏轼应邀题书《醉翁亭记》，于是醉翁亭随“欧文苏字”双绝名扬天下。当年，欧阳修常请好友到亭中饮酒抒怀，诚如《醉翁亭记》叙述：“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于酒也。”太常博士沈遵也慕名而来，赏景之余，创作出琴曲《醉翁吟》（又称《太守操》），欧阳修欣然为之配词，这成了文坛的一个佳话。如今所见的醉翁亭，在清代经过重修，驻足仔细打量：其顶为歇山式，四角翘起像鸟张开翅膀一样；亭中有“既饮不多缘何能醉”、“年尤未近奚自称翁”的楹联，颇值得寻味。说实在，醉翁亭尚与苏杭古典园林之楼阁比较，也许相去甚远，却硬生生地吸引了无数游人，这不为别的，只是因了《醉翁亭记》的特殊魅力。

在醉翁亭附近，有株枝苗叶茂的古梅，高达七米，花期不夺腊梅之先，也不争春梅之艳，却“自甘淡泊”独伴杏花开放，民间传说此系欧阳修手植；而“九曲流觞”则仿绍兴兰亭而建，古代文人在农历三月初三相聚，要置酒杯于渠中水面，它漂到谁跟前，谁就得取饮并作诗，由此不难想象昔日欧阳修与好友雅集盛况。

离开醉翁亭往西走，很快抵达同乐园。园内有些古色古香的建筑，最吸引人的是长廊中镶嵌着的宋代以来苏轼、董其昌、文征明、祝枝山、张璠图等名家书写的《醉翁亭记》碑文。在观赏琳琅满目的碑文时，当地老翁告知：欧阳修还曾为那里的丰乐亭写下《丰乐亭记》，其堪称《醉翁亭记》的姐妹篇。这位大文学家为一地作两“记”，实乃琅琊山之幸也！

沿琅琊古道继续前行，只见两旁树木茂盛得能够遮阳挡雨。特别是此处独有的“醉翁榆”亭亭如盖，或挺立于幽深山谷，或扎根于陡峭崖壁，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。据说，这种树起初仅生长在醉翁亭周围，欧阳修曾用它的细枝作手杖，故得其名。我觉得，琅琊山的树木如同这里的清泉、楼阁，也早已诗化；而在诗化的物象中，隐现的则是恰好1000周岁的欧阳修之朦胧身影。

游览了琅琊寺，再往上便来到了南天门，这里坐落着会峰阁、古碧霞宫等。我站在峰顶极目远眺，心里不禁感叹：琅琊山，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，还有哪座山似你这般，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而驰誉遐迩呢？



莱德杯，便说那不要紧，施拉格这个洋人，其实是“中国姑爷”，男单还在咱“自己人”手里；某国政坛变换，出来一个新总理，便说那是好事，他的身上，还有十六分之一“中国血统”呢！说现代足球，起源于大宋高俅脚下，已经是莫名其妙，至于呼啦圈的盛行，也说是华夏老祖宗的一项发明，就有点匪夷所思了。

太空下的长城也好，马克思的脚印也好，都出于一种教育下一代的好心，但这种好心，因为并不实事求是，反而误导了未成年人，如果神话一旦破灭，更使青少年们困惑怀疑。其实类似这种神话，我们的教育中并非仅有，例如为了证明雷锋精神是人类财富，就能大讲西点军校的雷锋塑像，西点就可能确有雷锋塑像，但美国军方塑像的出发点和我们弘扬的雷锋精神，又有多大共通呢？又例如为了证明人类大同，就来讲日本也有“共产主义”，日本确有个“山岸会”，号称“按劳分配、各取所需”，但这样的乌托邦，真是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吗？显然不是。所以关怀未成年人成长，就要讲科学，就要实事求是，就要把事情的真相和事物的本质告诉孩子，千万不要无中生有或以讹传讹，以致误导了幼小孩童，又污染了“马克思的脚印”。

大袜和小帽

赵全国

有个贵公子一心想占某美貌寡妇的便宜，就买了一匹布请她缝一双袜子。暗想，她生活拮据，若贪小，我便可趁机轻薄她。寡妇不但收下了那匹布，还主动索取一匹布说做里子用。公子大喜。过了几天寡妇拉出一双半条裤子长的大袜给他。公子差点晕倒。此事载于《点石斋画报》。

有个外国笑话可与它相映成趣：富翁拿着一块皮子问皮匠：“够缝一顶帽子吗？”皮匠说：“够。”他贪心地把帽子加到二顶、五顶……直至十顶。皮匠连声说：“可以可以”。富翁笑得牙肉也露出来了。交货那天，匠人要富翁伸出双手，把十顶小帽子逐个稳稳地套上他的指尖。

大袜和小帽在今天倒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的。古今中外嘲讽富人的故事多如牛毛，其实嘲讽的对象并不是富，而是坏心肠。

文工团员可以说是个个有绝活儿的，有人擅长弹奏乐器，有人擅长画宣传画，不仅如此，大家还要身兼数职，既是演员又是舞台工作人员；既是合唱队员，又是乐伴奏人员。比如曹鹏，他指挥军乐队演出，同时也是装置组的成员，他负责管理我们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——一头毛驴，这头驴驮着所有重的设备。有时毛驴也会“闹罢工”，累得走不动了，咋办？曹鹏就在一边拍篮球，驴子听到篮球的节奏就跟着他走了，被我们笑称为“曹式赶驴法”。再比如仲星火，他戏演得好，还会唱歌剧，扭起秧歌来也毫不含糊，文工团还有好多这样的同志。这个团体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阵容整齐的演出集体。

那时我们每隔三天就背起背包，带上道具，行军数十

在美国，画家陈逸飞去一位犹太人家做客。这位妇人一开门，就用沪语问：“依是上海人？”其语音语调与上海市民一模一样。这位妇人在纳粹时期，逃亡上海，幸免于难。她对上海存感激。二战期间，上海保护了3万犹太人。

此后十几年过去，这句上海话一直搁在陈逸飞的心头。他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上海的一段特殊的历史，看见了大时代下，个人的命运周折。从1996年起，陈逸飞开始筹备电影《逃亡上海》，只是命运没有成全他。他走得太匆忙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巴拉德的父亲在中国经商。1930年，巴拉德出生在上海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进攻设在中国的西方国家殖民地，将西方公民圈入集中营，巴拉德被羁押在日军所设的上海龙华难民营。1946年，战争结束后，16岁的巴拉德和父母返回英国。1985年，巴拉德将自己这段历史写成

传记，名为《太阳帝国》。这本书将导演斯皮尔伯格引到上海，以小说为蓝本，拍摄了同名电影。

1991年，巴拉德随BBC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重归上海，拍摄他家在新华路的老房子。弄堂里，有人过来看热闹，说着上海话指指点点，巴拉德觉得，他从来也不曾离开过上海。小时候的许多细节都无比清晰地回来了，比如就在昨天。张爱玲在美国，念起上海，亦是从上海叫卖开始的。比如家门前布店的甩卖声，楼下有人挑了担子，用上海腔调喊：“卖臭干！”

90年代初期，去香港。尖沙咀的一个公交车站，两个女子在讲话，一口老式的上海话，竟然忘记自己要坐车，一路跟在她们后面，痴掉了一般。

后来到潘迪华家去吃

青州云门山

陈炳熙

西泰与东崂，居中气亦豪。摩崖书大寿，孰敢比其高？

里换一个地方演出。往往是傍晚启程，翌日清晨到达新驻地，最多一天一夜连续行军120里。脚上打起水泡，但没有一个同志叫苦，行军时有说有唱，到了驻地还为房东挑水，打扫庭院，教儿童团唱歌，全村马上就热闹起来。

演出前要做好许多准备工作：装置组负责搭舞台；大小道具组搬桌子抬板凳，并借好演员表演时用的烟袋、镰刀等道具；服装组四处向老百姓借各色衣服。演员们在后台化妆时，音乐组的同志们把锣鼓敲得震天价响。部队战士和群众从四面八方入场，坐在背包上的战士们，相互拉唱歌。歌声此起彼伏。老百姓围在四周，说笑声不绝于耳，气氛煞是红火。

饭。她说，王家卫找她拍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的房东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说的一口上海话，是王家卫母亲那一代人的上海话，其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味道。

味道。上海话的味道是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。那是一份历史，一份文化。

牛康博士的《牛康上海话读本》潜心收集资料十多年，以词典的形式写成，每一个词条的后面，阐释的都是上海人的生活、历史、价值观与人生观。《牛康上海话读本》在语言上非常有趣，它探索了语言影响文化、思想和生活方式。读者可以从词条中看到当地历史的变迁，也可以看到上海人身上的传统烙印。有的条目是一些简短语言学方面的思索；有的条目是一些长段落，有的甚至长达几页，作者就此将有关市井、传说、逸事编织在里面。

中国的语言，尽管汉字相同，但不同的地方，语法、发音甚至意义都大不一样。上海人的语言反映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。在《牛康上海话读本》中，作者以

叙述的方式来解释他的条目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及独创性。《牛康上海话读本》不仅可以用来作为研究上海历史沿革的读本，也可以用做研究民族语言学的材料。它的价值也许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自身。

（本文为《牛康上海话读本》序）



1946年10月以后，山大剧团辗转于鲁东鲁西，进行了无数次战地演出。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演出不是在舞台上，而是在大路旁。那是在鲁南战役、莱芜战役开始之前，解放军早已秣马厉兵，战斗前夕憋足了劲头的部队向前沿阵地急行军，公路上长长的队伍迅速前移。听到的是齐刷刷的脚步声，看到的是一张张神情严肃的面孔。我们在公路边挥舞红旗引吭高歌，唱起鼓动歌曲，有说快板的，有喊口号的，京剧团的同志在大道上连续做翻跟头表演……

对文工团的军乐队队员来说，乐器非常珍贵，前线的战士靠武器战斗，而我们则是靠乐器战斗。有一回国民党军队逼近黄河，为了诱敌深入，我主力部队

温文儒雅的朱新龙，擅画现代人物，也精古装人物，文人雅士、仕女闺秀、释道神仙等皆得心应手，手法亦见新颖。工笔精细，小写意传神，阔笔大写豪放不羁，面目之多，意蕴之深，当今画坛并不多见。画风清高脱俗，诗意盎然，为人称道。

军旅诗人李中华为朱新龙画作题咏，一画一诗，互为补益，双璧浑成，颇堪玩味。如题《春风如醇酒》：“琵琶声声无限情，漫天梨花度春风。修竹似有几分醉，迷歌处处向人倾。”又题《听松图》：“遣情入深山，松涛携管弦。空林迷神韵，情漫天地间。”吾观朱新龙画作，确实可以诗释之者甚多，画家无意吟诗而其画犹如名诗句耳。作画大要，将邪、甜、俗、赖四字拒之画外，清韵自至矣。品画遣词，差可娱人娱己，吾不计工拙，聊赋数章供读者一笑。

泼墨人物《久逢知己须醉倒》，绘两位精神旺健的长者，松下席地而坐，畅饮叙旧，已带醉意。造型夸张、生动，墨色淋漓尽致，画境淡远，吾有诗为证：“一生大笑能几回，久逢知己须醉倒。苍松延寿论今古，闲看落英日萧条。”

新龙喜作荷花仕女，或双美焚香奏乐，一吹箫，一拨弦，流韵飘入荷塘，惊起翠羽飞去，吾诗云：“一

弄清影，醉草吓蛮书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一壶浊酒，祭酹乾坤。时而豪唱大江，饮马长城，咏秦时明月，览大漠风情，时而踏歌贺兰，放舟秦淮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敢将热血荐轩辕。笑是大笑，悲是大悲，喜是狂喜，乐是至乐，率直任性，抱朴达观，来去无拘束，进取总是缘，承继着中华传统文脉，释放着忧国忧民、爱乡爱土的情愫，他是艺术的苦行僧，更是理想的殉道者。

（左图为朱新龙作品）

强渡黄河，撤到河北面一侧向胶东转移，我们却还留在黄河南岸执行慰问任务。国民党的先遣队伍以及还乡团和我们只相距五六里路，黄昏时分我们已经听到特务的枪声砰砰，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丢下照明弹为其先锋部队照亮突袭的道路。我们找不到要去慰问的部队才知形势不妙，急忙掉头北上，直奔黄河大堤，最后是和一支殿后的解放军部队一同乘船，渡过了黄河，脱离危险。谁知刚上岸，就有一名女同志哭着说掉了单簧管，她哭着一定要回去拿，让大家先跟部队走。我也是吹单簧管的，十分理解她心里的感受，我就陪着她回对岸找乐器，还好，很快找到了那支单簧管，赶紧再渡河追大部队。

明日刊登一篇《押解路上险遭暗算》，敬请关注。

声两声三声五，声声杳向芙蓉浦。细雨和风催花放，婷婷绿叶滚玉珠。”或以工笔画《荷花仙子》，画风接近任伯年，然敷彩更为秀雅，仕女开相端丽，神情闲适，对花无语，若有所思。吾题以五言：“蓬动风不止，蓦然起绮思。品正花素洁，何来脂粉气。”以花喻人，触景生情，荷花仙子本是人间女子，洗尽铅华，其质也朴。

《琴棋书画》四屏条为新龙得意之作，各题六言于下：

“高山直入九霄，流水鸣弦环绕。难觅知音顾曲，离愁别绪煎熬。”《琴》）“莫轻对弈小道，品德最尊谨记。进退审时度势，胜负等观之。”《棋》）

“黑白天地神秘，笔墨人生重塑。信是字如其人，心正勾描佳作。”《书》）

“宜将满腹清兴，倾注三尺缣素。最忌沾染铜臭，谋利慌不择路！”《画》）

新龙嗜画成癖，全神贯注，已臻画人合一、纯青之境，他俨然画中角色，与英烈豪杰、名士骚客同呼吸、共命运。时而策马边关，仗剑要塞，弓如霹雳弦惊，气吞万里似虎，大雪满弓刀，鸣金得胜还；时而泛舟湖上，独钓寒江，起舞弄清影，醉草吓蛮书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一壶浊酒，祭酹乾坤。时而豪唱大江，饮马长城，咏秦时明月，览大漠风情，时而踏歌贺兰，放舟秦淮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敢将热血荐轩辕。笑是大笑，悲是大悲，喜是狂喜，乐是至乐，率直任性，抱朴达观，来去无拘束，进取总是缘，承继着中华传统文脉，释放着忧国忧民、爱乡爱土的情愫，他是艺术的苦行僧，更是理想的殉道者。

（左图为朱新龙作品）

明日刊登一篇《押解路上险遭暗算》，敬请关注。

烽火文艺兵